

#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先秦文化元典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 一大批思想家从各方面思考社会发展中伦理、道德、礼仪、法制等方面的问题, 留下了大量论著。这些论著给后代以长久的影响和无限启迪, 是中国文化的元典。自汉武帝“独尊儒术”, 意识形态归于一统, 不仅儒家思想不断被曲解, 先秦诸子其他几家也被掩盖与曲解; 近大半个世纪中, 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未能真正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先秦各家思想, 存在着简单化、贴标签的现象, 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论各家各派, 重在论一家与一家之异, 而忽略了一家内部之异与各家间的影响流变。慎到与韩非同为法家, 但思想上有很大区别, 慎到的法制思想与今天的法制思想颇多一致之处, 其“势”的思想反而与庄周的思想一致。纵横家是先秦诸子中最受诟病的一家, 但《鬼谷子》一书实开我国古代心理学、人际关系学等之先河。道教从宗教的方面看并不是很严密、完善, 应与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无神论思想, 而且这些思想包含在一些重要的典籍中有关。这些问题都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了的。

**[关键词]** 文化元典; 先秦诸子; 道家; 法家; 纵横家; 无神论; 道教

**[中图分类号]** B 0-0;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7)01-0028-06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7.01.003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形成时期, 各学派的思想家都在回顾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 认真思考此前一些圣君贤相、名儒大德有关论述的基础上, 为社会的和谐与正常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 百家争鸣, 可以说对社会意识形态各方面都做了穷尽性的探索, 为后代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它们给后人以长久的影响和无限启迪,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要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发展, 激活其生命力, 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 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我国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 历来的士人、学者, 没有不读“四书五经”的, 上至帝王, 下至平民百姓, 论事说理总以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节、义”一套为原则。但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末传入中国之后, 很快在中国一些启蒙主义思想家和

东南一带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 苏俄十月革命之后, 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翻维持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已是当时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的共识, 而且其影响迅速扩大。可见儒家思想中也有很多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因素。而历代统治阶级满口“仁义道德”, 他们有意歪曲了儒家思想以维持与巩固封建统治。今天我们研究儒学, 要从原始儒学入手, 吸收与弘扬其民主性的精华, 并且联系当前的社会现实, 加以新的阐释。

先秦时其他思想家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吸收、弘扬的东西。如墨家除了“天志”、“明鬼”的唯心主义思想应该批判, “非乐”、“尚同”之说有其局限性之外, 其他如“尚贤”、“节用”、“节葬”、“非攻”、“兼爱”等总体上说都是值得肯定的。后期墨家已不再提“天志”、“明鬼”, 而将其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成分大力发挥, 建立起比较完全的唯物主义体系。尤其是在逻辑学和光学、几何学等方面有开创性研究, 与先秦时期天文学、医学、数学的成就

**[收稿日期]** 2016-09-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10ZD&103)

**[作者简介]** 赵逵夫(1942—), 男, 甘肃西和人,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一起为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揭开了光辉的一页。只是由于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儒家重行慎言的传统，道家的“无为”思想，儒、道两家都张扬的“天人合一”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束缚文人的思想推行的科举制度的影响，先秦之时这种自然科学思想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道家是近代以来受批判较多的一家。但道家的经典《老子》、《庄子》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是因为其文辞好。《老子》中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是目前学界一致的看法。至于它的思想究竟属唯物主义，还是属唯心主义，学者们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老子》一书无论在哲学上、方法论上、军事上、政治上，都对后代一些思想家以多方面的启发，是不容否认的。我们对两千多年前的人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划分类别，确定是“打击”还是“依靠”的关系。

关于《庄子》一书，上世纪60年代以前都说其思想是唯心主义的，现在有的很有影响的哲学史著作认为它的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对庄子在认识论上的反对独断与教条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sup>[1]</sup> (PP. 379—421)。

法家讲“势”。所有的哲学史著作都说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的思想来自商鞅，“术”的思想来自申不害，“势”的思想来自慎到。但慎到讲的“势”，并不像韩非一样主要指权力、权势，而主要指已备的条件与事物的变化规律。《慎子·因循》中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其“因”指顺就、凭借条件与变化；“化”在这里指主观地改变条件与改变规律；“细”指成效细小）。《慎子·威德》中又说：“故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蚂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这里的“云”、“雾”似可以理解为地位优势，但其实主要是指条件。言飞龙、腾蛇也是凭借自然之力以达己功。韩非将“势”主要解释为地位和权力，成了他主张君主集权的理论依据。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对前代典籍阐释者的思想与主张。我们今天对先秦文化元典的阐释，也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应有的主张。这当中有接受什么、剔除什么、以什么为重点和采取怎样的观察角度的问题，也有贯穿什么观念的问题。

与韩非相比，庄周的思想倒是与慎到相近。人们熟知的《庄子》首篇《逍遥游》开篇即说鲲鹏化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

天之云”。然而，它是“海运则将徙于南溟”。郭庆藩释云：“若不海中运转，无以自致高升。”这是由于古人看到大海之水疾流旋转必有巨风（台风之类），所以庄周设想大鹏的飞起，必然要凭借海水大旋转时的巨风。《逍遥游》原文又引《齐谐》之言：“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扶摇”即“飏”，“抟扶摇”即乘狂飏。“去以六月息”，郭嵩焘言：“犹言乘长风也”）。就是说：即使大鹏这样巨大的鸟，要高飞远行也得凭借于巨风。这正与上引《慎子·威德》中“腾蛇游雾，飞龙乘云”的意思完全一致。可见庄周思想中也有与法家相通的地方。《庄子·天下》将慎到与彭蒙、田骈并列为道家，言其“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唐代成玄英《疏》说前七句之意为：“公正而不阿党，平易而无偏私，依理断决，无的主宰，所谓法者，其在于斯。”“依理用法，不顾前后，断决正直，无所惧虑，亦不运知（智）法外谋谟，守法而往，酷而无择。”则作为道家学者，却突出地显示了法家的思想。至于《老子》中与法家相通之处就更多了。慎到其实也是由道入法的。

以前关于先秦诸子的研究，往往根据其派别用画脸谱的办法，强调派中之同与派间之异，而忽略了派间之同与派中之异，把学术史中的复杂现象简单化了。

按说，在封建社会中广大臣民只有靠法制来取得一定的个人权利，但韩非强调君主专制，其法制思想也以此为中心。可以说韩非的法制思想在秦国的实现，彻底结束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以后历代统治者都以“儒”为表而以“法”为里，而且这“儒”非原始儒家思想，而是董仲舒的儒学和后来的宋明理学；“法”也与商鞅、慎到、荀况的法制思想不同，是以专制为基础的法家思想。在韩非的法制思想统一中国以及“独尊儒术”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先秦诸子中很多可贵的思想或曰思想萌芽被歪曲、掩盖，失去了其光辉。近大半世纪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是未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

关于慎到的法制思想，首先他强调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慎子·威德》云：

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故蓄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

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其次，他认为立法要上合于国家利益，下合于百姓习俗。《庄子·天下》中说：“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万物以为道理。”《慎子·威德》中说：“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官长也。”由之都可以看出他的立法原则。

再次，在法的推行上，他主张先进行引导，让人熟知法规，然后坚持依法办事，提出了所谓“推而后行，曳而后往”的原则（见《庄子·天下》所述）。

第四，他认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应依法办事，反对心治。他主张“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惠，定赏分财必由法”。他说：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慎子·君人》）

归纳以上几点来说，慎到所持是比较彻底的、完善的法制观，不是有执法权者无限度地制约别人而自己不受约束、完全出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制观。慎到的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与今天的社会有较多一致的地方，他的一些论述放在当时世界法制史范围来看，也放射着耀眼的光辉。但侯外庐等先生合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张晋藩等先生合著《中国法制史》（第二卷）对慎到都没有专门论述。过去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史著作也都对慎到不做专门论述，只是说他是韩非思想来源之一，对他的“势”的学说并无具体说明。只有张国华、饶鑫贤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册第二编第七章《法家的法律思想》中有一节为《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对慎到思想有所论述。我认为像慎到的法制思想这类文化资源，我们要认真地挖掘、研究，古为今用，来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

纵横家是先秦诸子中自古以来最受诟病的一家。我们必须看到，战国之时，一些无论是家族还是个人都毫无地位的士人，有的甚至是因犯罪而逃离本国者，因与某国君的一席之谈或向某国君上书言事而取得卿相之位，居于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贵族世袭制度，实为汉代

的举孝廉与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生在观念上奠定了基础。这在世界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另外，作为纵横家之经典的《鬼谷子》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探索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的著作，它研究总结劝谏、建议、协商、谈判和朝堂官场上下交际中的策略与技巧，在封建社会中不是没有意义的。儒家只讲为臣要忠，要有刚正之气，不能贪生怕死。这是对的。但给士人只灌输“犯颜直谏”、“杀身以成仁”的观念，使历代很多志士仁人在暴君庸主面前白白送了性命，自己虽“名留青史”，国家的损失和人民的灾难却并未能免。另外一些人则为了活命，即使知道国君的旨意与行为将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为了保命也缄口不言。秦赵高当刘邦、项羽之军已迫近咸阳之时，欲杀秦二世以免其追究责任，命人至宫中射秦二世，箭中幄帟，秦二世喊卫侍来护卫，卫侍皆惶恐不敢动，身边只一宦者，二世说：“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这是另一方面的典型。历代帝王统治人民、驾驭臣下，大都用权谋，甚至阴谋，而口上却是“仁义礼智信”那一套。层层官宦对待下属与老百姓同样如此。道家看透了这一点，却并没有研究如何对应，只是消极逃避。《鬼谷子》一书将这当中的隐秘一一揭出，使人掌握其规律，办成应办之事。书中的有些道理对人群、机构间的沟通、协商也有一定意义。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国心理学、人际关系学、管理学等方面的开山之作。然而，以往的思想史著作中从未有提及者，有的心理学史著作中，也不见专门论述。

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们的思想是复杂的，我们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得出科学的结论；肯定其正确的因素，而剔除、批判其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生活不一致的观点。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过去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或者只着眼于批判旧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与人民革命相抵触的方面，而忽略了于社会文明、文化建设有益的因素。在今天知识界、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客观地评价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应该说，我们以往对古代思想家只简单地以“唯心”、“唯物”为标准划作敌对的两大类，将此作为继承与批判的唯一标准，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就先秦文化元典的研究范围来说，也还有很多

工作可作。我们要真正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批判，而不是简单地划框框、戴帽子。只有这样，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论坛的话语权，才是有益的。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sup>[2]</sup>（P2）中国的无神论思想是产生很早的。恩格斯说，原始宗教是自发宗教，而阶级社会的宗教则是“人为的宗教”<sup>[3]</sup>（P550）。自发的宗教不说，人为的宗教在中国不但产生迟，而且一直没有成熟起来，道教不过是借用道家经典，在方士、巫术的基础上联系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又吸收了一些佛教教义形成的。不但一些历史人物被神化，如老聃成了太上老君或曰道德天尊，庄周成了南华真人，连屈原、张良、诸葛亮、关羽、张飞、岳飞都修了庙，人们烧香许愿，本为纪念祠堂，后来却变成道教庙宇，可见人们对道教神灵范围的认识很模糊。人们口中常说的“老天”、“老天爷”，似乎是决定一切的，但在道教神的系统中地位最高的是玉清元始天尊等“三清”，很多庙中又并不供“三清”；而很多道教经典中都没有的神，却供于宫观之中。有的学者觉得道教无论是神灵系统的专一与确定，还是教众组织的严密、入教仪式的规范和信教人同庙宇宫观之间的关系密切度，都无法同佛教、基督教等宗教相比，于是将儒学说成“儒教”（如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有《儒教研究》一书。据说还有一个儒教协会），以便赢得国际宗教学界的广泛认可。其实，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孔孟之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历代统治阶级及一些道学家、理学家歪曲孔子儒学的本义以为其统治服务，各州县都有文庙以祀孔子，陪祀之人比较固定，祭祀时间、仪式也明确规范。但儒学并不是宗教。我以为道教的不成熟同中国无神论思想产生很早且潜藏于一些重要经典中有关。民间将一些忠臣义士、节妇孝女也塑像供奉、许愿求签，就说明了道教深受儒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至迟在西周文献中已可以看出。我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有一些关于星座、日食、月食和有关气象的记录，这是以科学眼光看待宇宙中的自然现象，是无神论产生的基础。《诗经》中产生于西周末年的《雨无正》、《板》、《荡》、《瞻卬》等诗中，都有责骂“上帝”的语句，似乎同今天什么事弄坏了骂“老天”的情形相似，未必就是相信真有一个“上帝”。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载，虢君

在莘地降神，周太史过说“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以为政虐而求神，是亡国之兆。周惠王闻虢君求神赐给他土田，问太史闾，太史闾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真是振聋发聩之语。这也是以后的两千多年中无数思想家所铭记之言，只是多不说出口而了然于心，必要的情况下借天言事，而将重民轻神的思想体现在决策和处世的具体行为上。

《左传》僖公十六年（前644年）载，有陨石落于宋，时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他：

“是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祥”是徵兆之义。宋襄公问叔兴陨石落于宋国是吉？是凶？预兆了什么？叔兴指出两点，说得都很具体。但他开头先说“今兹鲁多大丧”，说的是现状。可见他后面预见的两点是从分析形势的发展而来。“鲁多大丧”对齐国卿大夫势力变化产生什么影响、齐鲁形势变化对宋国的安危产生什么影响，这里没有具体说。可以看出，叔兴是一位思想敏锐、看问题十分深刻的人，他是从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中得出结论。但面对宋襄公这样的人，叔兴只有以揭示陨石预示吉凶的语气回答，退下来却对同来说：宋襄公问得不对头。这本是自然变化方面的事，同社会人事的吉凶无关。吉凶完全在于人本身。他还特别说明：因为不好违逆宋襄公的意思，所以做了那样的回答。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骂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为商王族之后，且商人信神，又死守过去的礼义束缚。我以为《左传》中这段文字最典型地说明了何以历代很多思想深刻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家总是要借着天象之变化劝谏国君。尤其是在秦汉以后，臣子之言若是违背君意往往要掉脑袋，或者遭受刑罚（司马迁因言李陵之事而受宫刑即其例）。但帝王都信天帝神灵，臣子借天以言事，即使被拒也比直言之罪小。古人以《左传》为“五经”之佐，至唐代直接列入经书，它对后代有志于政坛者的启示，尽在不言之中。

《左传》鲁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年）载，鲁国大旱，鲁僖公要焚烧巫、尪以乞雨，臧文仲说：“修成郭（按：为备无道之国乘危进攻，又借以给民以粮，为救荒之策）、贬食、省用、务穡、劝分（按：指劝有积蓄者分施于贫困之家），此其务也。

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可见臧文仲对于迷信的一套完全持否定的态度。

春秋时郑国的子产也是一个不信天道神灵的思想家。《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年）载，有彗星起于辰星（又名大火）向西直指天汉。鲁大夫申须说宋、卫、陈、郑将有大火，郑臣裨灶言于子产，希望禳除之，子产不肯。后来四国果然发生火灾，裨灶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国人都要求禳除，连子产十分器重的子大叔也说：“可以救亡，子何爱（吝）焉？”子产说：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言难道不是偶尔言中）？

子产是坚决不信所谓“天道”、天帝之命的。《左传》昭公十九年载，郑都城外洧渊中有龙争斗。古人以龙为神物，故求禳祭，子产说：“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表现出同样的思想。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孔子对子产最为崇敬。《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载：“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言子产的仁爱，有古人之遗风。这说明了孔子的思想与子产是比较接近的。

先秦其他典籍中也有些无神论的思想资料。如《墨子·公孟》中载公孟子说：“无鬼神。”他说缠子：“子信鬼神，何异以踵解结。终无益也！”晏婴、尉繚、荀况等也有“无神论”的言论。儒家的最高圣人对突出的无神论者抱着极为钦佩的态度，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中国主要的经典，尤其是重要的文化元典中含有无神论的思想，应是中国道教一直未能成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面我们所举史书中明确记载表现了具有无神论思想的人物，这些人当时能表达出那种思想，不仅仅同他们的哲学思想有关，也与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及与被评论事件相关人的关系有关。前二人周太史过、太史嚭为周天子之臣，虢君管不着，故对虢君之行事可以直言，而无所忌讳。周惠王闻“有神降于莘”时问太史过，“是何故也？”太史过的回答则是：“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在信神的人听起来，太史过也是信神的；而我们联系他说的“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这句话来看，他显然是不信神的。太史过答周惠王之语表现出中

国古代具有无神论思想的卓越政治家、思想家在君权至上社会中的绝顶聪明。

第三个是周内史叔兴。宋君同样管不着他，但他是出使于宋国，身有责任，故回答宋君之问虽然是从分析列国中有关国家的形势言之，但不明确驳宋君相信陨石预示吉凶的愚蠢思想，而在下面对自己的人才说，也可以看出他的聪明。

第四个是臧文仲，是鲁僖公（在位33年）朝掌握鲁国大权的重臣。鲁僖公尚无为而治，故大事多听命于臧文仲等卿大夫，这是臧文仲在鲁僖公主张烧巫尪乞雨之时敢于直言的主要原因。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少见的。

第五个是郑子产，他使夹在大国之间的郑国能多次避免祸患，且不失国格。子产自郑简公十三年（前553年）立为卿，至郑定公八年（前522年）卒，为政32年，其间主政22年，郑国的老臣子展、子皮都极看重他，故他说话直率。

我们由周太史过、周内史叔兴在不同场合对同一事的不同表述方法可以知道，我国古代很多思想深刻的政治家是并不相信鬼神的。他们不明确表现出这种思想，只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一种策略而已。

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出现了无数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给我们留下大量的经典著作，这是我们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它们中的一些内容在过去或被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文人所曲解，或由于历史的原因未得确解。今天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现代科学思想加以认真研究，使它们在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文化建设中散发出光和热，也为全世界和平稳定地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联系当时的社会状况认真分析研究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次要在吸收前人校注训解成果的基础上认真研读有关典籍，从整体看问题，做到正确理解原文；再次要有开阔的视野，如习总书记所指出三方面资源的第三个方面，注意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把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放到世界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中去看，用新的视角去观察，用新的方法去探究。切忌贴标签、生搬硬套。只有这样，才能在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做出成绩。

## [参考文献]

- [1] 任继愈主编. 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2012.
- [2]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3] 恩格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An Analysis of Cultural Classics of the Pre-Qin Periods from Marxism Perspective

ZHAO Kui-fu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here were vying schools of thoughts, and a multitude of thinkers reflected on various issues related to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ch as ethics, morals, rites and legal system. As a result, numerous treatises came into being, and they have been influencing and inspiring later generation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However, Confucianism gained monopoly status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ideology became no longer diverse, leading to the constant mis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ism and even the oblivion of other schools originated in the Pre-Qin Periods.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failed to witness the interpretations of schools of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for historical reasons, which cause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s either too simplified or muffled by certain inappropriate labels. Moreover, when they came to compare different schools, what they focused was not so much on internal differences within a certain school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its counterparts as on external differences among other schools.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following aspects were neglected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Shen Dao and Han Fei were both disciples of Legalism, but there's a discrepancy in their ideas. The idea of legal system endorsed by Shen Dao bear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that of today, while his thought of Power ("Shi") is in line with that of Zhuang Zi; Among all the schools bloomed in the Pre-Qin Periods, school of Diplomacy received most criticism. However, its book of *Gui Gu Zi* served to usher in a new era of psycholog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ancient China. From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Daoism is far from strict and complete, but it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atheism came into being during earlier times in China and was later embodied in some important cultural classics.

**[Key words]** cultural classics; schools of thoughts in the Pre-Qin periods; Daoism; Legalism; School of Diplomacy; Atheism; Religious Daoism

(责任编辑 周蓉/校对 小舟)